

## 主體錯置、區隔他者、復國隱喻 ——論盧思道〈聽蟬鳴篇〉中的離散論述

王美秀<sup>\*</sup>

（收稿日期：100 年 6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10 月 12 日）

### 提要

北朝著名詩人盧思道在北齊亡國之年寫下雜言詩〈聽蟬鳴篇〉，其中蘊涵深切的離散論述。詩人以秋為主軸，以悲為基調，以寒蟬為喻託，為自己建構離散者身分。指出主體錯置乃造成離散之因，空間的錯置、時間永不復返與生命價值的遺失，使離散主體無所依歸，成為卑微孤獨的受難者。詩人進而以離散意識將北周帝都長安，再現為空洞冷漠之城，將屈附北周的北齊舊臣歸類為道德低下之人，並從而區隔我族與他者。詩人的隱退之願從未實現，反而成為他身為離散者無形的抗拒，連結他的復國行動。詩人更倒轉與改寫典故，使復國義涵鮮明可辨，更以詩歌形式的繼承強化離散者身分，並以此寄託復國隱喻。

關鍵詞：盧思道、〈聽蟬鳴篇〉、北朝文學、古典詩歌、離散文學

---

<sup>\*</sup> 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 the U. K.）東亞系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亡國遺民的一場文學盛會

盧思道（535-586）字子行，為東晉名臣盧諶（284-350）的後代，北朝世家范陽盧氏的成員。其人聰爽俊辯，通脫不羈，才學兼著，尤善詩文。北齊未亡之前，他以世家子弟，權貴親屬的身分，率意於官場，更以詩人才士的身分稱譽文壇。<sup>1</sup>北齊滅亡（577）後，盧思道被遣往北周都城長安。根據史傳所載，當時與盧思道一同被遣往長安的北齊文士，共有十八人之多。《北齊書·陽休之傳》曰：

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義、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劼、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sup>2</sup>

列名在這一趟流亡之旅的北齊遺民，或出身世家，或結姻帝室，或歷任顯要，或享譽文壇，在北齊素負名望。這十八人之中，在《北齊書·文苑傳》「序論」中被點名者即有十二人，分別為：陽休之、李德林、盧思道、李若、薛道衡、顏之推、陸義、王劼、李孝貞、辛德源、陸開明、高行恭等。<sup>3</sup>文獻記載無疑揭示了此一流亡隊伍的「文學」性質。《文苑傳》未提及的其餘六人中，袁聿修「以名家子歷任清華」<sup>4</sup>；李祖欽有女為北齊後主高緯左娥英；<sup>5</sup>元脩伯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後；<sup>6</sup>司馬幼之為司馬子如之侄，「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sup>7</sup>崔達拏為博陵崔氏之後，崔暹之子，門高地清，尚北齊文襄帝高澄長女樂安公主；<sup>8</sup>源文宗名彪，為北魏重臣元子恭之子，「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sup>9</sup>可見這支流亡隊伍不僅是文學才士的組合，更是清流貴胄的組合。

<sup>1</sup> 盧思道有傳，見〔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75〈盧思道傳〉，頁1397-1405。

<sup>2</sup>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卷42〈陽休之傳〉，頁563-564；同書卷43〈源彪傳〉亦云：「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敕入京。」，頁578。

<sup>3</sup> 《北齊書》，卷45〈文苑傳〉，頁602-604。

<sup>4</sup> 同前註，卷42〈袁聿修傳〉，頁565。

<sup>5</sup>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14〈后妃傳下〉曰：「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頁526。

<sup>6</sup> 《北齊書》，卷43〈源彪傳〉，頁578-579。

<sup>7</sup> 《北齊書》，卷18〈司馬子如傳〉，頁241；又，《北齊書》卷8〈後主紀〉載：「（天統三年）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頁99。

<sup>8</sup> 《北齊書》，卷30〈崔暹傳〉，頁406；《北史》，卷33〈崔挺傳附崔暹〉，頁1190-1191、〈陽尼

這群原本身分尊貴，門地清華的北齊遺民，在到達長安不久，進行了一場文學盛會——同題賦詩。《隋書·盧思道傳》曰：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sup>10</sup>

史書上並未說明同行的十八人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參與了這次的文學活動，但是，本傳既曰「數人」，又說庾信（513-581）曾「遍覽諸同作者」，則參與的人數應不僅二三人。從現存文獻得知，至少盧思道、顏之推與陽休之都參與了這場盛會。同題賦詩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常見的文學活動，本不足為奇；不過，這場文學盛會，與該時期常見的同題賦詩有些不同。一如前述，這場文學盛會詳細的起因、形式、參與人等，皆已無法考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當時所寫的詩，不僅在彼此之間流傳，「他們之外」的人也有機會閱讀，正因如此，當時北周文壇宗主庾信，<sup>11</sup>才得以「遍覽諸同作」。然則這場文學盛會不僅是相同身分者——「北齊遺民」的文字交流，更是一場公開或半公開的、某種程度宣告進入北周文壇的標幟性文學活動。這群北齊遺民，剛剛經歷了天崩地坼的變局，正承受國破家亡的痛苦，又被迫離鄉背井，遷往敵國首都，斯時斯地，斯景斯境，身世之感、鄉關之思、故國之情，應該是這些文士正在經歷與亟待整理的心緒。但在這個極可能參與人數眾多，而無隱私可言的創作活動中，他們如何藉由書寫梳理與安頓他們的懷鄉之情與故國之思？如何看待既是異國也是敵國的「新鄉」？又如何在書寫中適切的表述或重構身分？簡而言之，這些北齊遺民如何在書寫中進行離散論述。這是一個關涉深度理解文學的課題，頗值得探究。

這場文學盛會中的書寫成果，現存文獻只留下顏之推與盧思道的詩作，而顏之推為羈北南士之一，並非第一次遭遇亡國之慟，<sup>12</sup>他的遭遇遠較盧思道複雜，若簡單的視其為北齊遺民恐有未妥。因此，本文將以盧思道〈聽蟬鳴篇〉為討論對象，嘗試探討上述問題。

傳附陽休之〉，頁 1727。

<sup>9</sup> 《北齊書》，卷 43〈源彪傳〉，頁 577-579。

<sup>10</sup> 《隋書》，卷 57〈盧思道傳〉，頁 1398。

<sup>11</sup> 根據北周滕王宇文逌為《庾子山集》所作的序文中，稱庾信在北周時，「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見〔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 年），頁 64。另外，在《隋書》中提到，隋煬帝楊廣雅好文藝，晉王時期屬文學庾信體，及見由梁入周的柳顧言之文，其文體乃變。可見庾信在北周時儼然為文壇宗師。詳見《隋書》，卷 58，頁 1423。

<sup>12</sup> 顏之推在〈觀我生賦〉的自注中曾自言「三為亡國之人」。詳〔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99 年），頁 623。

前此，學界論及盧思道詩歌者，鮮少措意於〈聽蟬鳴篇〉而多以其邊塞詩〈從軍行〉為觀察中心，討論其文學成就。<sup>13</sup>稍有論及此詩者，或以為詩人「由秋蟬之悲鳴，聯想到自己遠離故國，隻身來游長安，遍干權貴，功業未就的人生遭際，結以壯志空老，欲歸不甘的慨嘆。」<sup>14</sup>這種說法，恐有誤解詩意之虞。或以為此詩以表現嚮往隱逸為主，以盧思道自思「宦遊不達，儒冠誤身，反不如求仙和冒險的「浮華」之士可取富貴，因此勾起了思鄉和歸隱的想法。」<sup>15</sup>這種觀點則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唯楊金梅與陳海英曾指出，盧思道詩歌中成就最高的作品當屬〈聽蟬鳴篇〉，認為北齊時代儘管鄴下漢族士人對於江左政權還懷著文化意義上的認可，但其「國家」概念毫無疑問就是北齊政權。北齊滅亡對漢族士人的影響一如西晉滅亡之於其時之士人，心理上有一種真切的亡國之感。對於被迫西遷的山東士人而言，長安不僅是異鄉，且是敵國，他們的亡國之痛、離鄉之悲絲毫不亞於來自江南的庾信、王褒諸人。〈聽蟬鳴篇〉作於盧思道入關後不久，全詩借蟬鳴之悲抒發自己內心的痛苦，是一首典型的寄託深遠借物詠志之作。<sup>16</sup>此說實遠勝於其他評論，可惜對於盧思道如何在此詩中寄寓亡國之痛與思鄉之悲，則未有進一步的分析。不過，上述前輩學者之研究成果，無論觀點如何，皆各具學術價值，本文將以此為基礎，進行討論，期望為盧思道詩歌的閱讀提供新的理解途徑，並為北朝文學，乃至於南北朝文學提供新的觀察角度。

## 二、悲秋、受難、主體錯置

國破家亡的盧思道，在被迫進入長安之後，寫下了他成為北齊遺民的第一首詩，根據史傳文獻與現存盧思道作品，這首詩很可能也是他最後的一首詩。這首〈聽蟬鳴篇〉詩的內容如下：

<sup>13</sup> 有關盧思道〈從軍行〉的相關討論請詳參康震：〈歷史的追溯——對隋代詩歌的文化闡釋〉，《唐都學刊》第13卷（1997年第2期，總第52期），頁12-17；霍然：〈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江漢論壇》第二期，1997年，頁70-73。吳功正：〈論隋代的文學審美特徵〉，《東岳論叢》第22卷第3期（2001年5月），頁115-118。曹道衡：〈試論北朝文學〉，收錄於《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82-102。

<sup>14</sup> 杜曉勤：〈北齊文學傳統與初唐詩歌革新之關係〉，《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頁56-63。

<sup>15</sup>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462-463。

<sup>16</sup> 楊金梅、陳海英：〈論盧思道的思想及其詩歌特色〉，《浙江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2010年7月），頁41-45。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群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慙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敝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恆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嫫媿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sup>17</sup>

全詩可分為四段。開篇至「纔聞客子淚先垂」為首段，自「故鄉已超忽」至「明鏡空悲潘掾髮」為次段，自「長安城裏帝王州」至「誰憶田單倦土牛」為第三段，「歸去來」以下為末段。全詩以「秋」為背景；「秋」既是詩歌推進的時間軸線，也是詩歌寫作的季節。首段中寒蟬高鳴的秋日、次段中涼夜的秋月、末段中離離堪把的秋菊，都是具象寫實的「秋」的顯露點。再者，貫穿此詩的「秋」意，並不僅止於自然季節的示現，更隱含了「秋」的身體意義與社會、文化意義。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對於秋季的描述，早已結合了自然季節的特質與社會意義。《禮記·月令》中提到：

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sup>18</sup>

又說：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壞墻垣，補城郭。<sup>19</sup>

<sup>17</sup>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隋詩〉，卷1，頁2637。本文中，凡涉及本詩之內容者一依遼欽立所輯之內容。〈聽蟬鳴篇〉之題，《隋書》卷59〈盧思道傳〉與《北史》卷30〈盧玄傳附盧思道〉皆作〈聽蟬鳴篇〉，〔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之《盧武陽集》、遼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之《隋詩》之部則作〈聽鳴蟬篇〉；本文以先出之史傳為依據。

<sup>1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322。

<sup>19</sup> 同前註，頁323-324。

因此，寒蟬悲鳴的「秋」，既是一個屬於自然運行的，規律性的節令，同時也兼有收穫、完結、療傷、重整秩序的積極意義與凋零、斷刑、殺戮、整肅的消極義涵，是一個深具社會意義的季節。在文學創作中，做為一個被描述的季節，「秋」經常以萬物凋零、日漸加深的涼意及相對上清亮的明月等物理現象為主要線索，以連繫孤寂、寒冷、殘缺，乃至於感傷流離或悲嘆歲月推移等情感、心理現象，更進而綰結了遊子他鄉、逐臣棄妻、亡國遺民的無依無靠，而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意義的「秋」。<sup>20</sup>

因此，在詩歌最表層的自然之「秋」之下，第二層次的「秋」意來自於身體意義，指向詩人寫作詩歌時的人生階段與當時的心境。「紅塵敝衣」與「明鏡悲髮」二句指涉了詩人的年紀，以及糾結於此年紀之下的憂鬱與感傷。盧思道在北齊滅亡（577）不久即被遣送長安，當時約當 43 歲，<sup>21</sup>正是人生之秋的中年。除了年紀逐漸老邁，猶如秋日寒意日深一日，此時盧思道的身分也已經由世家子弟、權貴重臣，轉而成為前朝舊臣、亡國遺民。從詩篇內容可以感受到詩人對於新社會、新都城、新的權力空間，採取了疏離的立場。如果積極進取、官場上的得意可以比喻為春夏，則此時盧思道在新社會、新環境中的處境與心境，自是涼「秋」時節無疑。

詩歌中的「秋」意，更緊密結合了詩人正在承受與累積的離散（diaspora）經驗。離散表示一種身屬國被剝奪的狀態，它並非處於進入另一個集體途中，而是分割的，它證明了權宜性和迫切性，以及立即的、未經中介（in-between）的存在。<sup>22</sup>造成離散的原因，常常指向一種離散者無法對抗的巨大的強迫力量，因此離散也經常隱含著懲罰與災難的義涵。離散——被迫離鄉背井，與族群分散——的特質因此經常與孤獨、痛苦，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故鄉、故國的想像不可分離。

盧思道寫作〈聽蟬鳴篇〉時，正經歷國破家亡的巨變，又被迫離鄉背井來至異鄉，而這異鄉又是亡我國、毀我家的敵國之都。成為離散者的詩人，聽聞蟬鳴之聲，心中頓生無極之悲。不僅是自然現象中秋蟬特有的音質所造成的聲之意象，使詩人感懷悲傷，而是在詩人不斷累積的離散經驗中的痛苦，被蟬聲所牽引；蟬聲之「悲」，其實是詩人心境的映照。詩中所稱「別人」（離別之人）與「客子」（客居之子），既是異鄉遊子的集體性稱呼，

<sup>20</sup> 有關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悲秋」主題，可參見小尾郊一撰，邵毅平譯：〈詠秋詩〉，《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26-61；王立：〈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悲秋主題〉，《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147-171；鄭毓瑜：〈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漢學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04 年 12 月），頁 1-34。

<sup>21</sup> 以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為據，盧思道生於西魏文帝大統元年（535），卒於隋文帝開皇六年（586），北齊滅亡之年（577）盧思道 43 歲。詳前揭書，頁 460。

<sup>22</sup> 林玉玲：〈移民與離散〉，收入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 年），頁 95-128。

當然也是詩人自我表述的身分。不論是做為一個戰敗亡國的俘虜，或是一個遷移至異鄉的文士，此時的詩人在敵國與異鄉的土地上，在涼風吹襲的夜晚，不得不接受「故鄉已超忽」的事實，並且想像「空庭正蕪沒」的景象正在無情的發生。「空庭」可以指人去樓空的家園庭院，更可以暗指不再有百官拜闕的朝廷。對於詩人而言，除了思鄉之苦，更有亡國之痛，寫「故」鄉正是寫「故」國。但儘管「宗廟宮室，盡為禾黍」的亡國景象，可能正在詩人無法親見的另一個空間中發生，身為亡國遺民的詩人卻只能無可奈何的「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空間的阻隔在時間的介入之後，故園、故鄉、故國就在這一朝一夕、朝朝夕夕之間，越來越退向不可能歸返的位置，這毋寧是更令人惶恐、焦慮、悲傷的真正原因。

離散者常以「想像」取代實際的經驗，以回返故鄉、回顧故國。從詩人被迫離開以後，故鄉、故國的一切後續發展，只能從空幻的想像中尋得，而這想像又以回魂的方式，不斷與故鄉的記憶交涉，可是，記憶卻永遠停留在離開故鄉的那一刻。「一夕復一朝」的「復」字，可以是一種「累加」的含義，指出時間不斷的向前奔流；但此「復」也可以是「回旋」的含義，指詩人日復一日，重複的在記憶與想像中，不斷重構與解構故鄉的圖像。在這種實際上無意義，但對詩人而言深具意義的行為中，經常造成生命情態的停滯。「坐見涼秋月」的「坐」字因而不僅是實際的身體行為，更具有徒勞無功的衍申義涵。「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既指涉空間上的關河險阻，同時也指涉了時間的無法追返，二者交互作用之下，遂使天邊遊子欲歸無路，而想像故鄉最終成為故鄉想像。在更深層的意義中，故鄉、故國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離散主體及其族群向前繼承的、長期建構並依恃的生命意義的源頭。<sup>23</sup>因此，當故鄉成為不可攀越的干天峭路時，生命的意義也同時被解構。「紅塵早敝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二句，指出歷經了複雜而高低起伏的人生之路，已使詩人的心千瘡百孔，猶如敝衣，而明鏡中折射映照出的人，已經嘗盡世態炎涼而兩鬢飛霜。「早」字透露了追名逐利使人傷心害性的後設性警示，「空」字則總結式的指出了官場得失的徒然。詩人借用潘岳（247-300）與陸機（261-303）的典故，發出了生命失去無義，一切追尋終歸徒然的喟嘆。「離散」因而不僅是空間的錯置——失根，更是時間的不可追返——失憶，同時也是生命意義的失落——失義。

柯恆（Robin Cohen）曾聲稱離散「涉及身體居住在某一國家，但靈魂或精神上旅行於該國家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sup>24</sup>換言之，離散源於主體錯置（displacement），錯置造成失根、失憶與失義，使離散主體成為一個卑微的受難者，在孤獨之中承受痛苦。以此思之，在〈聽蟬鳴篇〉中，盧思道以寒蟬為詠述對象，以開展詩篇，其中實有深意。

<sup>23</sup> 此處有關故鄉、故國與空間、時間上的交涉，來自於王德威的啟發。詳氏著：〈原鄉神話的追尋者——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年），頁249-277。

<sup>24</sup>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Washington UP., 1997), pp.135-136。

魏晉南北朝詠蟬詩賦雖然不多，但歌詠蟬的小傳統已然形成。這個傳統以主觀寫物，託物言志，借物抒情為途徑，其主旨在於歌詠蟬——尤其是寒蟬——的美德。<sup>25</sup>時間最早而保存完整的詠蟬賦為曹植（192-232）的〈蟬賦〉。曹植在此賦中稱讚蟬曰：

實澹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眾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sup>26</sup>

文中著重於描寫蟬的習性：棲高枝、飲朝露，不捕殺其他昆蟲等，並且主觀的將蟬的形象塑造成與物無求，澹泊寡欲，能獨樂長吟，而具有清介之心的貞士。不僅將蟬人格化，也彰顯了牠的高潔與清貞。西晉·傅玄（217-278）也曾為文讚美蟬，其〈蟬賦〉曰：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玄昭于后土兮，雖在穢而逾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噪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泊无為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遂自託乎蘭林；嗟群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擊暢于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sup>27</sup>

賦中除了延續曹植的說法，詠讚蟬的德性之外，更將蟬獨特的生態，與陰陽相生、四季輪替的大自然運行相結合，從玄思奧理的途徑，進一步推升了蟬的高度。稍後於傅玄的陸雲（262-303）則在其〈寒蟬賦〉序文中，具體的稱頌蟬有六德，其文曰：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于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之述。夫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sup>28</sup>

<sup>25</sup> 有關詠物詩的託物言志傳統，林淑貞有精闢的析論。詳參氏著：《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年）、〈從詩義類比論李賀「馬詩」之自我隱喻與歷史取關〉，《興大中文學報》17（2005年6月），頁195-229、〈寓意、符號與敘寫技巧——論寓言詩與敘事詩、詠物詩、賦比興之交疊與分歧〉，《興大中文學報》20（2006年12月），頁27-62。

<sup>26</sup> 《全三國文》，卷14，〔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冊，頁1130下。

<sup>27</sup> 《全晉文》，卷46，《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頁1721上。

<sup>28</sup> 同前註，第2冊，頁2034下。



作者結合蟬的習性與外型而稱讚蟬具有「文」「清」「廉」「儉」「信」「容」六德，更指出「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顯然已經將古代賢臣士大夫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形象折射於蟬的身上。<sup>29</sup>同時，陸雲也賦予了蟬具有選擇的能力與自由意志的形象。其文云：

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  
原思歎于蓬室，孤竹吟于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于鳴鳩，節妙  
乎鷗鵠。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迴條。<sup>30</sup>

寒蟬身處涼秋，卻能有所抉擇，勇於堅持「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顯現出高於鳴鳩與鷗鵠的志節。東晉·郭璞（276-324）《爾雅圖贊·釋蟬》也稱：

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sup>31</sup>

認為蟬能「潛蛻棄穢」，將蟬視為一具有自我意志、可以選擇立場的自由主體。

相對於上述各種對於蟬的讚頌，傅玄之子傅咸（239-294）的〈黏蟬賦〉可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呈現蟬的負面形象的作品。他在賦文之前作序曰：

櫻桃其為樹則多蔭，其為果則先孰，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逍遙其下。有  
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  
亦猶人之得意于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sup>32</sup>

賦文內容大抵與序文無異。文中以蟬被黏捕，成為小兒的玩物，乃因偷安忘危，疏於自警自勵。猶如得意之人，身處富貴時，耽溺寵譽而疏於修德遠患，以致一朝禍至而流離失所，甚至身敗名裂。蟬之於傅咸，明顯成為他敦品進德，居安思危的一種參照對象，而非如前述詩人，以蟬自喻，僅將蟬視為書寫主體的認同對象。

除了上述人格化、品德化，乃至於政治化的形象塑造之外，中國神話傳說中的蟬，則具有濃厚的悲劇色彩。蟬的來歷有兩種說法：「朽木化成」說與「齊女化成」說。前者出

<sup>29</sup> 陳小芒、廖文華：〈蟬詩與蟬文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1期（2003年11月），頁189-191。

<sup>30</sup> 《全晉文》，卷10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頁2034下。

<sup>31</sup> 同前註，卷121，第3冊，頁2155下。

<sup>32</sup> 同前註，卷51，第2冊，頁1754下-1755上。

於晚唐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sup>33</sup>遠後於盧思道之時,故暫不予討論。「齊女化成」說則出自晉·崔豹《古今注》,其文曰:

牛亨問(董仲舒)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嚙喉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sup>34</sup>

此說明顯使受難與悲怨成為蟬的獨特內涵;<sup>35</sup>不過,蟬的受難者形象,早在《莊子》中已經出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為《莊子·外篇·山木》篇中的一則寓言。以螳螂為例,寓言的含意在於表達得意之處便是禍敗之源的哲學思考;<sup>36</sup>但就蟬而言,則此寓言無疑指涉了深陷困境與受難的義涵。

衡諸一般現象,蟬之受難本不限於寒蟬,但詩人文士自傷流離,遂逐漸於書寫中強化寒蟬失群哀鳴之特質,使寒蟬成為受難者之象徵。承前文所論,蟬的美德多顯現於抉擇與堅持的勇氣,而抉擇與堅持多由於身處困境。前引曹植〈蟬賦〉在描述蟬的品德之後,接著敘述蟬的困境,曰:

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勁斧。飄高翔而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眾難而弗獲兮,遂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蔭兮,托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于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于獼猴。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于膳夫兮,歸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慄慄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sup>37</sup>

曹植筆下的蟬顯然命運多舛,既苦於黃雀、螳螂的捕食,又需逃避蜘蛛毒網與草蟲之襲擊。本以為依托在宮宇名果的修幹茂蔭之下,可免於重重苦難,卻不料為遊戲園圃的狡童所得,無法逃逸而至捐命。即便是傅咸〈黏蟬賦〉,在將蟬描述為偷安忘危,未能修德遠禍的個體時,也同時呈現了蟬深陷困境(甚至是絕境)的受難者形象。陸雲〈寒蟬賦〉中的

<sup>33</sup>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頁166。

<sup>34</sup> [晉]崔豹:《古今注》(四部叢刊三編·子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66年),卷下,〈問答釋義第八〉,頁十。

<sup>35</sup> 陳小芒、廖文華:〈蟬詩與蟬文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1期(2003年11月),頁189-191。

<sup>36</sup> [戰國]莊周撰,[清]郭慶藩編:《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7上〈山木篇〉,頁695;侯立兵:〈漢魏六朝賦中的蟬意象〉,《求索》(2007年10月),頁168-170。

<sup>37</sup> 《全三國文》,卷14,《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二冊,頁1130下。

蟬，雖然免於深陷網罟或遭黏捕的命運，卻不免於歲聿云暮的秋涼時分，感運悲聲；這都是受難形象的呈現。所可注意者，陸雲三度將蟬的落難形象與「貧士」互為交錯，首云寒蟬「攀木寒鳴，貧士所嘆」，次云「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最後又云：

于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殷憂，歎卒歲之無衣。望泰清巍峨，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于皇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sup>38</sup>

賦文中身為寒蟬觀察者的貧士，其位置已與作者重疊；同時，貧士之所以於「四時云暮」之時，「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殷憂，歎卒歲之無衣」，乃因其「思希光而無階」。簡而言之，乃自薦無門，自悲才能無所用，故而陷於貧困。實則貧士之困境與寒蟬身處北風雨雪而無法高飛之困境，殊無二致。以此觀之，寒蟬乃貧士，貧士即寒蟬，而此貧士又實為陸雲自託。陸雲自道作賦之因，乃由於：

余昔僑處，切有感焉。<sup>39</sup>

顯見作者對寒蟬產生切身之感，對於蟬的種種特質進行（再）發現與人格化、折射與隱喻，皆因當時作者之身「僑處」異鄉，作者之才不得其「位」，飄零無根而陷於貧困，猶如寒蟬在秋風蕭瑟，黃葉飄落時節，失群獨棲。可以說，寒蟬與作者（貧士）的困境，皆起因主體錯置所致。主體因錯置而離散，因離散而受難，此正是盧思道寫作此詩的重要背景，也是他離散論述的重點。

〈聽蟬鳴篇〉一開始即道出秋蟬「錯置」的情形。秋日高鳴的寒蟬並非棲身於脩竹茂林中，而是在「金門」之側的「玉樹」裏。以「金」「玉」形容寒蟬所處位置，看似養尊處優，其實暗指所處非宜。「金門」可能是金門（宮殿）的簡稱，也可能是金馬門（官署）的省略，當然也可能指金漆大門（富貴人家）；無論何者，金門之「側」都難有成蔭的樹林，何況時屬萬物飄零的秋日。非時非地之下的秋蟬因而只得「數葉」可蔽身——安全受到威脅，只有「一枝」可抱——沒有其他選擇。這正是盧思道等人的寫照，身為亡國遺民，有如俘虜般被強迫遷至敵國首都，成為無根的離散者，隨時可能有殺身之禍，卻無法決定自己的去留。因此，在晚風中悲鳴的秋蟬聲，更加觸動詩人的傷感。身為「別人」、

<sup>38</sup> 《全晉文》，卷 10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 2 冊，頁 2035 上。

<sup>39</sup> 同前註，頁 2034 下。

「客子」，一聽蟬鳴之聲即心斷淚垂，悲傷無極。在詩歌的開篇首段，詩人已經指出了受難源於離散，離散則因主體錯置。

### 三、都城與他者、隱居與抗拒

失去家國之後的盧思道，將自己託喻為寒蟬，建構了離散者的身分，獨自承受苦難與悲傷。但身為進入敵國都城長安的移入者，他則以邊緣人、旁觀者自居。〈聽蟬鳴篇〉第三段所呈現的，就是這個邊緣人、旁觀者所見所感的長安意象。

論者曾指出，都城作為權力階級生活娛樂、交際周旋的場域，外在空間的實踐其實與內在意識的象徵相互表裡，一個都市可以是某種意象化了的形式，而人們正是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共通的意象，來「看到」這座城市或發展出對於這座城市的認知。顯然這座城市意象並不就等於從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城市，當然也不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互動下的經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浮顯的立體座標。<sup>40</sup>在這樣的概念之下，可以發現中國文人對於長安的意象，與其他朝代的都城意象差別不大。這個天子所在之地，自然是政治權力結構的中心。但除了權與利，這個帝國的都城當然也是經濟活躍，族群會集，文化高度呈現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建築、形形色色的車馬與人群、喧囂而活絡的商業活動等等，都是都城中常見的景象。在盧思道之前，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都城為題材的作品很多，除了左思〈三都賦〉等篇幅較長、嘗試採取全視域關照的京都賦之外，相對上篇幅較為短小的詩歌，也頗有一些描述都城的佳作。以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長安道〉題下諸詩為例，詩中或者描繪都城金碧輝煌的建築，或者描寫都城複雜的巷弄，或者歌詠仕女歌姬的妖豔，或者敘述任俠的風發意氣；紫陌紅塵、風花拂衣、賣藥鬻珠、宴客留賓；<sup>41</sup>在詩人的生花妙筆之下，長安的都城意象早已交織成一個美麗、繁華、充滿生氣也充滿機會的地方。

但是，盧思道詩中的再現空間長安，卻是一個處處矗立著高大宏偉的建築，卻冷漠空洞的地方。穿梭在這些建築物之間的，盡是一些追逐權利，輕浮無德，意志不堅，虛有其表的人。那是因為文學中的空間本是一個再現空間，是直接經由意象與象徵而存在的空間，既是居民的生活空間，也是藝術家、作家、哲學家描述或企圖超越描述的空間。這個空間不是一個客觀存在，而是一個總是被想像改變與調整的支配空間。它覆蓋在物理空間

<sup>40</sup> 鄭毓瑜：〈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收入《欲蓋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年），頁135-168。

<sup>41</sup>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卷23〈橫吹曲辭三〉，頁343-346。

上，為它的主體的需要而製造象徵。<sup>42</sup>同時，城市意象不是城市本身，也不是某些天生的、基本的空間知覺過程之反映。大部分的人知覺空間的方法是經由社會學習的結果，並主要建基在個人及其所屬族群的經驗上。因此，不同的社會網絡下，不同的個體或族群，對同一個都城或地方也會有不同的概念。城市認知在絕大部分上，是城市想像，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同時，城市是一個論述，這個論述透過一種專有的語言，對它的居民說話；城市也是一種書寫，在城市中活動的人，乃是一種讀者，隨著他的身分與居留目的，各依所需取用了發言的片段，而後依照個人經驗進行詮釋與轉用。<sup>43</sup>據此，則盧思道詩中所呈現的長安意象，無乃是自居邊緣的詩人在這個城市中，所接收的片段的、負面的語言；也是詩人所投射的離散意識的一部分。

在詩歌第三段中，詩人採取旁觀的位置與疏離的心態，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長安。他以整齊的句型排比出類似街坊一般的效果，長長的、並排的七言句則有如高聳齊整的建築，造成無形的壓力。「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二句寫都城中，視線所及皆是雄偉、冷漠，屬於掌權者所有的建築，「西望」「東瞻」二詞直指書寫主體所見，都是已轉成權力符碼的建築，以向上承接「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二句；同時，這兩個詞也可以指追逐名利者東瞻西望，汲汲營營的情態，以向下連接「說客恆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二句。「說客」「越使」兩句寫穿梭於這些早已幻化成權力象徵的建築之間的，追逐名利的人。「持小冠出」者，已謀得一小官職而沾沾自喜之人，「懷寶劍遊」者，尚待售其才而志在必得之人；「出」者出權貴之門，「遊者」進權貴之門。進進出出，則權貴之門庭若市矣。然而，在這些求取功名的人群中，空有其名，虛有其表者所在多是。「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兩句，描寫言行不一與志節不堅的人士，一邊營造不慕榮利的形象以沽名釣譽，另一邊卻攀結權勢，成為富貴中人。盧思道隱隱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降附或歸順敵國的北齊遺臣。<sup>44</sup>

一般而言，離散主體與其所居處之國主流社會之間的關係，可以方便的分為抗拒模式（resistance model）與同化模式（assimilation model）。略言之，在面對離散主體居處之國的主流社會及文化時，通常不是選擇抗拒，就是選擇同化。<sup>45</sup>更簡單的說，離散主體居處

<sup>42</sup> Henri Lefebvre, 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39

<sup>43</sup> 此處的概念得自葛迪勒（M. Gottdiener）與亞歷山卓·拉哥波羅斯（Alexandria ph. Lagopoulos）撰，吳瓊芬等譯：〈城市與符號〉與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撰，王弘志譯：〈符號學與都市〉，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頁505-526、527-538。

<sup>44</sup> 有關降附或歸順北周的北齊舊臣，請詳參牟發松：〈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年第1輯（總62輯），頁87-101。

<sup>45</sup>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20。

之地與故國或故鄉恆常處於對置／峙的位置。離散主體對於居處地及其主流的回應方式，非適應即疏離，非投入即旁觀，非同化即抗拒。但既為「離散」者，則其回應方式必是疏離、旁觀與抗拒。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改朝換代之際，常對舉順民與遺民，並以之為我族與他者的判別。<sup>46</sup>遺民以不仕新朝為立身之基，政治立場成為辨別其身分最重要的依據。除了從事軍事抗爭活動的人，大多數遺民對新朝的態度可以簡單概括為消極的不認同、不合作。人們在敘述遺民事蹟時，也往往強化他們對出仕新朝官員的棄絕，以此作為其品格高峻、節操堅定的有力證明。<sup>47</sup>由於追逐名利常須以妥協屈附為交換，對亡國遺民而言，交換方式無非轉為順民，屈附新朝。因此，「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二句，所進行的乃是雙重的人格批判，既指富貴功名原本為虛誑而令人厭惡之事，只有短視近利而不知遠慮避禍的輕薄之人才會樂在其中；同時也間接指斥了忘卻亡國之痛，輕易被權勢所網羅的順民為品德低下的輕薄之人。這種批判正可與作者另一篇著名的散文〈勞生論〉成為互文。作者自述為文之因，曰：「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睹時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sup>48</sup>可見他對當時的「人事」與「時路」感慨甚深。明·張溥（1602-1641）在〈盧武陽集題辭〉中將此文與南朝·劉峻（463-522）的〈廣絕交論〉並提，給予極高的評價。<sup>49</sup>

在〈聽蟬鳴篇〉短小的篇幅中，盧思道所表露者，並非僅只他個人建功立業的心願，<sup>50</sup>更不是為了進入新生活圈而嘗試寫作時，對周漢盛世的歷史情結，發出今昔之比與政治興亡的感嘆而已。<sup>51</sup>反而是帶著抗拒的心，在批判的同時，以追逐權勢等同於屈附敵國，將這些輕薄無憂之人界定為他者，而以「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二句慨嘆自己遭遇木梗之患，終將客死他鄉，不得復歸故里，<sup>52</sup>縱然心懷忠貞，卻復國無望，在漂泊無

<sup>46</sup> 曹淑娟：〈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收入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1-74。

<sup>47</sup> 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頁131-162。

<sup>48</sup> 《隋書》，卷57〈盧思道傳〉，頁1402。

<sup>49</sup> 〔明〕張溥撰，楊家駱主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辭注》（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頁300；有關〈勞生論〉的討論可參見吳功正：〈論隋代的文學審美特徵〉，《東岳論叢》第22卷第3期（2001年5月），頁115-118。

<sup>50</sup> 康震認為「此詩便將士人渴求功業之心寄寓在對長安文化傳統的回顧之中。」又說：「思道所處之山東河北士族士族階層，具有經世致用、建功立業政治傳統。」盧思道本人也曾在〈仰贈特進陽休之詩〉七章的〈序〉中表露建功立業的心願，而「長安尚功致用的文化傳統正與盧思道的文化個性相契合。」〈聽蟬鳴篇〉因此于悽愴中寓慷慨之情，淒切中有健舉之氣，深得世人稱美。」詳氏著：〈文化整合視野中的詩史進程——論隋代詩歌的文化史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總第189期），頁80-84。

<sup>51</sup> 此說出自李俊，詳見氏著：〈北朝後期詩歌創作心理的本土認同〉，《南都學壇》第24卷第2期（2004年3月），頁66-69。

<sup>52</sup> 「木梗」的典故，請詳〔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重印本），卷10〈齊策三〉、卷18〈趙策一〉，頁588-589、頁968-969。

依的孤獨中，再次深化自己的離散者身分。身分建構的重要方式之一，即在區隔他者；而盧思道正是經由再現長安都城意象的同時，完成了我族與他者的區隔。如此一來，不僅使其離散者的身分更為明確，更使離散者、受難者與志節堅定、品德高峻相結合。

高尚的品德與堅定的志節，是淡泊名利的隱士常有的人格特質。在〈聽蟬鳴篇〉中，都城既然是一個充斥權利追逐的空間，當然不是志節堅定者應處之地。對於北齊遺民而言，北周政權是造成他們離散的暴力之源，其帝都長安自難以久處。因此，身處離散之地的離散者，最終許下了歸隱之願，企圖擺脫離散。

論者曾曰，離散之所以為離散是因為存在著兩個「中心」。一個是離散的始源，也就是家國，包括了家園、部族、國家等。另一個則是居留地，也就是離散社群賴以依附並形成網絡的地方。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在「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根」屬於家國，屬於過去與記憶，屬於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導向未知。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不時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sup>53</sup>當離散主體頻頻回顧故鄉故國——舊中心時，即顯現了尋根的意願，同時也顯現了對於居留地——新「中心」的抵抗意圖，以及對於已然造成或即將造成跨界事實的否認、抗拒。跨界(border-crossing)，不僅指地理上的移動、錯置，更包括了身分上的增衍與重構，以及種族與文化的混血。隨著時間的累積，離散者必須面對的事實是：日漸遠離離散的始源——故國，而與離散所居之地日漸密切，從「花果飄零」朝向「落地生根」發展。這種必然的發展，是離散主體無力抗拒、無從迴避，卻又極力避免與抗拒的對象。地理空間的越界是離散形成的最初因素，而文化空間的越界，即文化的混血，則是阻斷回歸故國（傳統與文化）之路，使離散永無結束之日的最後因素。對於離散者而言，表面上雖有「根」與「路」的選擇，事實上卻幾乎無法選擇，因為只有極少數的離散者經由尋根而成功的落葉歸根，終結離散者身分而成為返鄉人；絕大多數的離散者最終都走上「路」而成為永遠的離散者，對於這群人而言，尋根只能更深固他們離散者的身分。對盧思道而言，他的「根」早已離土，日漸枯萎，徒留記憶，雖可藉以療傷、止渴，卻永遠不能回返；而他的「路」卻又因抗拒而被他自己所阻斷，他不願歸順新的統治者，更將歸順者簡化為追逐名利的輕薄無德之人，將他們區隔為非我族類的他者。然則，他既無根又無路，將何去何從？隱退，乃成為詩人唯一的選擇。

在詩歌末段，詩人將自己類比於陶淵明。「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三句很明顯化用了陶淵明〈歸去來辭〉以及〈飲酒詩〉第五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sup>54</sup>之句，以託喻隱居之美樂。「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二句則借用蔡邕

<sup>53</sup>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頁31。

<sup>54</sup> 陶淵明的〈飲酒詩〉與〈歸去來辭〉並見〔晉〕陶淵明撰，袁行霽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47、460-461。

與揚雄的典故，表示寧可選擇隱居也不願趨炎附勢。曹魏應璩〈百一詩〉云：「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sup>55</sup>此詞與意又輾轉取自蔡邕〈與袁公書〉所言：「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sup>56</sup>揚雄於王莽時校書於天祿閣。揚雄與劉歆友善而有黨附王莽之毀，然其恬於勢利，安貧好古而樂道。<sup>57</sup>全詩最後以問句「何如還驅少游馬」作結。「少游馬」乃借用馬援典故，意謂倘能時光倒流，寧可乘下澤車、騎款段馬，過簡樸的生活，也不願再為功名而辛苦奔波。<sup>58</sup>

隱居對於盧思道而言並不陌生，盧思道的父親盧道亮就是一位終身不仕的隱士。<sup>59</sup>但是，當時北周的時空環境，並不有利於北齊遺民隱退。因為北周政權為了提升國家的文化實力，更為了鬆動舊北齊勳貴豪族盤根錯節的勢力，在滅了北齊之後，強制性的要求負有名字的北齊舊臣出任官職。甚至動用行政權，指示州郡地方政府，必要時強勢勒送這些文士前往都城。<sup>60</sup>根據《北史》記載，唐代史家李延壽的祖父、故北齊晉州別駕李超在北齊滅亡後，「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往。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縣勒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急言歸。」<sup>61</sup>《隋書·薛道衡傳》也記載，「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sup>62</sup>《隋書·文學·崔儵傳》又載曰，清河崔儵為北齊文林館學士之一，「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sup>63</sup>這些北齊舊臣在國家滅亡之後的第一選擇都是歸隱，希望遠離敵國政權中心，晦跡丘園，逍遙林下，

<sup>55</sup> 遼欽立：〈魏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8，頁469。

<sup>56</sup> 〔東漢〕蔡邕撰，〔明〕張溥輯：《蔡中郎集》，《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1冊，頁506。又，蔡邕隱居的事蹟不明，但其平生有兩次較長期賦閒在野的紀錄。一為未出仕之前，大約在建寧三年（170）以前，另一次大約在熹平六年（177）至中平六年（189）之間，當時蔡邕得罪當權者，為避禍而遠走江南。詳參〔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60〈蔡邕傳〉，頁1979-2008。

<sup>57</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87〈揚雄傳〉（臺北：世界書局，1978年），頁3513-3586。

<sup>58</sup> 《後漢書》，卷24〈馬援傳〉曰：「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禦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裏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裏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詳《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838。

<sup>59</sup> 《隋書》卷57〈盧思道傳〉，頁1397

<sup>60</sup> 關於北齊遺民遭強勢勒送長安之事，牟發松與王怡辰有精闢的討論。詳見牟發松：〈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年第1輯（總62輯），頁87-101；王怡辰：〈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通識研究集刊》第十期（2006年12月），頁41-54。

<sup>61</sup> 《北史》，卷100〈序傳〉，頁3340。

<sup>62</sup> 《隋書》，卷57〈薛道衡傳〉，頁1406。

<sup>63</sup> 《隋書》，卷76〈文學傳〉，頁1733。



但顯然都不能如願。這也是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所說：「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的原因。<sup>64</sup>這種不自由的嚴肅氛圍，盧思道應該也有所感受，但他還是做了歸隱的選擇。

在完成〈聽蟬鳴篇〉不久，盧思道「以母疾還鄉」，不過，他並未因此獲得淡泊寧靜的隱居生活，反而參與了一場北齊復國的軍事行動。《隋書》本傳載曰：

（思道）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文舉嘉而宥之。<sup>65</sup>

在北周宇文神舉的傳記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其文曰：

高祖親戎北征，令神舉與原國公姬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sup>66</sup>

這場軍事行動對北周政權而言是叛變，對北齊遺民而言，卻是復國之戰。此復國之戰起因於建德六年（577）十月開始，北周武帝無情的誅殺北齊皇族，挑起了北齊遺民更深的仇恨。同年十二月，北齊宗室高寶寧擁立高洋第三子高紹義為帝，起兵抗周。他們的起兵獲得多方響應，又得突厥為援，遂成燎原之勢，成為齊人以正面衝突企圖復國最有利的一次軍事行動。<sup>67</sup>響應高紹義的范陽盧昌期，為盧思道叔父盧道虔之子，盧思道的堂兄。盧道虔先娶北魏孝文帝女濟南長公主，後又娶北魏宗室元氏之女，盧昌期即元氏所生。事實上，自北魏以至北齊，范陽盧氏曾有多人與皇親貴戚聯姻，盧思道的一位外甥女曾貴為北齊皇后，<sup>68</sup>則盧氏家族對於北齊的忠貞，已不僅是君臣關係，更含有血脈相連的家族因素。

雖然離散美學本就隱含反抗政治，<sup>69</sup>而且這次事件製造了曲折的故事，為盧思道傑出的文才錦上添花，但也因此為他帶來無法去除的無形印記，使他的生命航程因此有了重大的轉向。《隋書·辛德源傳》曾記載曰：

<sup>64</sup>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頁 534。

<sup>65</sup> 《隋書》，卷 57〈盧思道傳〉，頁 398。

<sup>66</sup> 《周書》，卷 40〈宇文神舉傳〉，頁 715。

<sup>67</sup> 關於北齊抗周的軍事行動，請詳參王怡辰：〈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通識研究集刊》第十期（2006 年 12 月），頁 41-54。

<sup>68</sup> 北齊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詳《北齊書》，卷 9〈皇后傳〉，頁 126；盧氏家族與皇親貴戚的聯姻，請詳《北史》，卷 30〈盧玄傳〉，頁 1071-1116。

<sup>69</sup> 李有成：〈「密西西比的馬薩拉」與離散美學〉，《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頁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奸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sup>70</sup>

可見曾經參與任何一種、任何一次對抗北周的軍事行動的北齊遺民，從此成為政府的監視對象，隨時可能被羅織罪名。這個後遺效應甚至延續至隋朝時期。唐代史家曾評論盧思道曰：

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曆周、隋，咸見推重。李（孝貞）稱一代俊偉，薛（道衡）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榘，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途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sup>71</sup>

對於盧思道的文才給予最高的評價，但對他的官場失意，歸因於「不護細行」。乍讀之下，似乎頗以盧思道品德有虧為憾，但細閱之後，可以查覺其中不乏深意。北齊時期的盧思道官途寥落，或許可以歸因於品德問題，但入北周以後的盧思道，一開始就沒有得到表現的機會，更遑論「不護細行」。此外，「細行」常與「大節」對舉，「不護細行」者未必於「大節有虧」。因此，此「不護細行」之評，固然指盧思道前半生北齊時期的放蕩不羈，但未嘗不是暗指他入周後因參與復國行動，表現了忠義大節，而不利於他在新朝的立身遷職。盧思道的後半生輾轉於掌教上士、武陽太守、散騎侍郎等職，五十二歲時卒於長安。<sup>72</sup>他在〈聽蟬鳴篇〉詩中寫下的隱居之願從未實現，反而成為他身為離散者最後的、無形的抗拒，並以此連接了他一生中最嚴肅的一件大事——參與復國之戰。

---

129-148

<sup>70</sup> 《隋書》，卷 58 〈辛德源傳〉，頁 1422。

<sup>71</sup> 《隋書》，卷 57 〈盧思道傳〉，頁 1414。

<sup>72</sup> 同前註，頁 11397-1403。

#### 四、典故倒轉、「形式」繼承與復國隱喻

雖然盧思道參與復國行動的時間在書寫〈聽蟬鳴篇〉之後，但在詩歌之中其實已經蘊涵復國隱喻，他的復國隱喻隱藏在倒轉、改造典故與詩歌的形式繼承之中。

論者曾指出，所謂的「擬古」與「用事」其實都反映了鑑賞判斷中所提示的「典範」問題，不同的是「用事」指向了作家對於過往已定的事例的一種借代與解釋，並且著重在作家對於過往經驗的理解與認同。至於在「擬古」的表現上更包含兩個不同的面向，其一是就實際創作的層面而來的對於作品表現形式上的「學習摹擬」，另一則是在情感層面上對於摹擬對象的生活與境遇所懷有的「認同」。更為重要的是，透過認同作用所伴隨的對於過往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不論「擬古」或「用事」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在」的一種自覺，使得「過去」能與作家當下所屬的「現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contemporaneity)，並且以此喚起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sup>73</sup>另一方面，特殊的用典方式，例如：倒轉、改造典故，則除了集體意識的喚起之外，將產生另一種效果，即在文本閱讀時同時產生熟悉與疏離(defamiliarization)的效果，熟悉之感來自代代相傳的理解，疏離之感則由於這些被轉化的典故以背離一般理解的方式出現，而使讀者產生了特殊感，這種特殊感使讀者重新審視典故與文本的關係，遂使原本熟悉它們的讀者在無意間擁有了詮釋這類文本的某種特權。<sup>74</sup>

在〈聽蟬鳴篇〉詩中有兩句令人困惑，或者說耐人尋味的句子。句中引用了文學中常用的典故，卻以倒轉、改造的方式，使它的語意產生變化。這兩個句子是：

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

「木梗」的典故來自《戰國策》中蘇秦遊說趙惠文王時的相國李兌的一段話。其文曰：

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鬥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

<sup>73</sup>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詮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75。

<sup>74</sup>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頁23-24。

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sup>75</sup>

故事中的木梗遭遇災難時，隨水逐流，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終將客死異鄉，無法歸返故里。《說苑》中也記載了類似的故事。<sup>76</sup>木梗的故事既指涉了國家安全與生存危機，也指向個人失去國家之後，無所依託而流離失所的命運。「木梗」之典在當時並非罕見，庾信詩即有「漂流從木梗」之句，<sup>77</sup>但以「嫫姚」連結「木梗」則頗令人困惑。「嫫姚」一般指西漢名將霍去病。霍去病（140-117B.C.）十八歲時擔任漢武帝的官職，為剽姚校尉，開始參與征討匈奴的帝國事業，此後長年征戰，戰功彪炳。「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是他留下的名言。<sup>78</sup>霍去病雖英年早逝，然以伐敵衛國留名青史。觀其平生事蹟，並無與木梗之患相連者，更無從理解其嗟歎之由來。至於「土牛」一詞，出自《關尹子》，其文曰：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土牛木馬」指虛有其表而無其實的無用之物。《周書·蘇綽傳》曾引用此典，曰：

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sup>79</sup>

引文中的「土牛」與《關尹子》中的詞意相同。不過，〈聽蟬鳴篇〉詩中的「土牛」與前述辭義相差甚遠，應該是「火牛」之轉用，即田單復國時所用的火牛陣。問題是，田單何曾「倦土牛」？細查《史記》或《戰國策》等歷史文獻中有關田單的記載，並無與此相關之事蹟或意涵。<sup>80</sup>「誰憶田單倦土牛」一句中的「田單」，張溥所輯《盧武陽集》逕作「田單」，<sup>81</sup>在明·馮惟訥（1513-1572）所輯的《古詩紀》中，此句亦作「田單」，但其下又以

<sup>75</sup> 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卷18〈趙策一〉，頁968-969。

<sup>76</sup> 〔西漢〕劉向撰，盧元駿註譯：〈正諫〉，《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卷9，頁277。

<sup>77</sup> 庾信〈和張侍中述懷〉詩，請詳〔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頁252。

<sup>78</sup>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卷111〈衛將軍驃騎列傳〉，2921-2947、《漢書》，卷55〈衛青霍去病傳〉，頁2471-2494。

<sup>79</sup> 《周書》，卷23〈蘇綽傳〉，頁386。

<sup>80</sup> 《史記》，卷83〈田單列傳〉，2453-2457、《戰國策》，卷13〈齊策六〉，頁363-373。

<sup>81</sup> 〔隋〕盧思道：《盧武陽集》，〔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冊，頁630上。

小字註曰「一作蘭皋」。<sup>82</sup>若作「蘭皋」，<sup>83</sup>則恰可與「土牛」前後銜接，指春耕或春耕之祭祀；「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蘭皋倦土牛」二句之意，或即謂追求功名富貴者，於事業高峰時多不能綢繆於未雨而思及木梗之悲，亦復難有急流勇退而回歸田園淡泊自適之想；或者亦可指一般人皆以嫖姚將軍之征戰為風光之事，誰能洞見其長年征戰，居無定所，甚有家難歸的漂泊實質？又有多少人能體會春耕時牛倦人暍而任意休憩於蘭草澤曲之自由自在，以及在其中得以保全的高潔人格？上述二解皆可聯結此詩末段，以歸隱為志的訴求。若選擇「田單」二字而作「誰憶田單倦土牛」，上述二解亦皆可成立。但若斟酌詩句中對仗的情況——「詎念」對「誰憶」，「嫖姚」對「田單」，「嗟」對「倦」，「木梗」對「土牛」——在結構、詞義與美感上似乎更勝一籌。雖然盧思道之時，詩歌在結構上並無明確的範式與嚴格的形式要求，但綜觀此詩整體上的呈現，詩人對於句式、用詞，顯然都極講究。因此，作「誰憶田單倦土牛」的可能性似乎較高。

就結構上而言，「嫖姚」、「木梗」、「田單」、「土牛」，以及與田單相連的「火牛（陣）」等諸詞背後所指的人與故事，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是在連結「嫖姚」與「木偶」，改「火牛」為「土牛」，「嗟」「倦」二字既做為連結之用，又反轉原有典故中的人物形象，如此一來，立即在閱讀上產生極大的疏離感。語言學家曾指出，一個詞的意義，代表一種思維和語言的混合，它在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和不同的情境中無限制的變化，因此詞義是動態結構（dynamic formations）而不是靜態結構（static formations），它隨著思維功能的多樣化而變化。<sup>84</sup>因此，當舊語詞因違反常態的組合或使用方式而產生疏離感時，必將引動讀者的注意力，同時啟動重新尋找新語意的思考，進而形成一種新的詮釋。這就如同戲劇學家所說，當劇場指號過程被間離時，即被陌生化而不是自發化時，觀眾就轉而注意符號學的方法，意識到符號——工具及其操作。此即所謂間離效果。間離效果的造成方法是將司空見慣的對象，變成具有吸引力的對象，即從普通的、熟悉的、可直接接受的對象，轉為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出人意表的對象。<sup>85</sup>在這樣的理論引導之下重新審視詩句，將可發現在典故被改造、反轉時，個別典故的含義——為保家衛國而投身長期征戰的嫖姚校尉、失去家國而漂泊無依的木梗、作為前鋒奇陣的彩衣土牛，以及存亡續絕、興復家國於旦夕之危的田單——反而個個獨立而鮮明，更加引起注意，而保國、復國的義涵，便在這樣的重新審視之下凸顯出來。

<sup>82</sup> [明]馮惟訥：《古詩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32〈隋詩·盧思道〉，頁462。

<sup>83</sup> 屈原〈離騷〉曰：「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注曰：「澤曲曰皋。」朱熹注曰：「其中有蘭，故曰蘭皋。」詳見姜亮夫：《屈原賦校註》（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42。

<sup>84</sup> 維果茨基（L. Vygotsky）著，李維譯：《思維與語言》（臺北：昭明出版社，2000年），頁187-231。

<sup>85</sup> 伊拉姆（K. Elam）著，王坤譯：〈布拉格結構主義與劇場符號〉，《符號學與戲劇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8年），頁4-19。

盧思道在〈聽蟬鳴篇〉中隱藏的最大的一個復國隱喻在詩歌的形式。此詩的形式是一種以三言句開啟的雜言體詩歌，這種形式顯然受到王肅的〈悲平城〉與蕭綽的〈悲落葉〉、〈聽鐘鳴〉的影響而形成先後繼承關係。<sup>86</sup>這種與漢樂府關係密切的詩歌形式，在南北朝時期的民間各有發展脈絡，各具地方特色，但在北魏文士之間，王肅之前僅有高允（390-487）的〈王子喬〉與此類近，<sup>87</sup>但高允的〈王子喬〉在命題、內容、形式、音樂性（音韻與配樂）等各方面，都顯現出此詩乃遊仙一類漢樂府詩的遺緒，<sup>88</sup>而王肅的詩則明顯不同。王肅的詩在形式上較偏向南方吳歌西曲；在音樂方面，屬於一種不能入樂的徒歌；在內容方面則由兒女情長轉向身世感懷；在風格上，又與吳歌西曲的婉轉柔媚大異其趣而呈現質樸、蒼茫與悲涼之感。因此，王肅之詩究竟與漢魏樂府之間具有何種程度的淵源，又受有南朝民歌多少影響，實為一值得探究的課題，但就此類型詩歌在北朝的開展而言，王肅之詩或可視為原初之作。<sup>89</sup>

王肅（463-501），字恭懿，為東晉名相王導的後人；曾仕南齊，因為政治因素，其父王奐與兄弟等親人皆為齊武帝蕭賾所殺。王肅輾轉於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投奔北魏，正逢孝文帝遷都洛陽的前夕。當時北魏孝文帝需才孔急，而琅邪王氏家學深厚，王肅遂憑其才學受到帝王的禮遇，對北魏禮儀的建制與修定貢獻良多，為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的一大功臣。<sup>90</sup>王肅的〈悲平城〉詩載於《魏書·祖瑩傳》，曰：

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sup>91</sup>

上文記載的場面，既包含了南北文學交流的意義，同時也顯現了極為濃厚的南北相爭氛圍。<sup>92</sup>彭城王元勰（473-508）為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之弟，本傳稱他「少而歧嶷，姿性不

<sup>86</sup>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頁354、463；曹道衡：〈略論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問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頁71-72。

<sup>87</sup>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201。

<sup>88</sup> 王美秀：〈高允及其文學初論〉，《中外文學》第20卷第5期，頁123-156。

<sup>89</sup> 曹道衡因此認為這種詩歌形式是王肅帶進北魏的。詳註86。

<sup>90</sup> 〔北魏〕魏收：《魏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卷63〈王肅傳〉，頁1407-1413、〔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49〈王奐傳〉，頁847-853。

<sup>91</sup> 《魏書》，卷82〈祖瑩傳〉，頁1799。

<sup>92</sup> 關於〈悲平城〉與〈悲彭城〉二詩的文化意涵，楊玉成有極為精闢的分析。請詳參氏著：〈士庶、

群」，「敏而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sup>93</sup>他經常參與文學活動，是孝文帝極為親愛與信任的兄弟。根據史傳記載，他曾陪同孝文帝巡幸代都，於途中應制作詩。《魏書》曰：

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傘，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sup>94</sup>

可見不僅王肅和祖瑩曾經詠作這種以三言句開啟，以五言句承接的雜言短詩，元勰也曾有同樣形式的創作。所不同者，王肅的短詩中充滿離散主體沈重鬱結的悲傷，祖瑩與元勰的詩歌中並沒有這種感情，而比較趨近於詠史與懷古。<sup>95</sup>

較王肅稍晚投奔北魏的蕭綜，也曾創作類似的詩歌。蕭綜（479-528），字世謙，入北魏後改名贊；梁武帝蕭衍第二子。綜母吳淑媛原為南齊東昏侯蕭寶卷後宮，齊亡時懷有身孕卻匿而不言，後得幸於蕭衍，七月即生綜，蕭衍封為豫章王。及綜長，其母以實情告之。綜遂於梁武帝普通六年（525）投奔北魏。受封為丹陽王，又尚北魏莊帝姊壽陽長公主。卒於魏，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東魏元象（538-539）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為子，將他祔葬於蕭氏墓園。<sup>96</sup>根據《梁書》的記載，「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而「當時見者莫不悲之。」<sup>97</sup>這兩組詩的內容如下：

#### 〈聽鍾鳴〉

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台。

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半啼。

---

性別、地域——論南北朝的文學閱讀》，收入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上冊，頁1-90。

<sup>93</sup> 《魏書》，卷21下〈獻文六王·彭城王傳〉，頁571。

<sup>94</sup> 同前註，頁572。此詩後人題為〈應制賦銅鞮山松詩〉，本文進行討論時皆採用此詩題。詳逢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205。

<sup>95</sup> 同註92。

<sup>96</sup> 《梁書》，卷55〈豫章王綜傳〉，頁823-825、《魏書》，卷59〈蕭寶夤傳附蕭綜傳〉，頁1325-1326。有關蕭綜身分認同的討論，請參王美秀：〈論洛陽伽藍記中的異史並存與文化原鄉〉，《通識教育年刊》第五期（2003年12月），頁19-40。

<sup>97</sup> 《梁書》，卷55〈豫章王綜傳〉，頁825。

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揜抑。

〈悲落葉〉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

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sup>98</sup>

在形式上，〈悲落葉〉顯然與王肅的〈悲平城〉較為接近，尤其是〈悲落葉〉的第三首，幾乎完全相同。〈悲落葉〉的第一、二首，則在三言五言之間，由位置的替換增加變化。至於〈聽鍾鳴〉，不僅增加句數以擴充篇幅，更增加七言句型，挪移詩句的位置，造成結構上的變化，而延展了詩歌的義蘊與美感。從句形與組合方式觀察，盧思道的〈聽蟬鳴篇〉顯然是從蕭綜的〈聽鍾鳴〉演化而來，其詩題「聽蟬鳴」明顯有仿擬「聽鍾鳴」之跡。無論是詩題或形式，盧思道的詩明顯與王肅、蕭綜兩人的作品形成繼承關係。

王肅的〈悲平城〉與蕭綜〈聽鍾鳴〉、〈悲落葉〉，不僅在詩歌的形式上形成繼承關係，在內容、情感上更蘊涵了相同的離散／反離散的特質。「離散」起因於被迫離鄉背井，投奔異國；「反離散」則是自傷失根漂泊，悲嘆無可歸屬之餘，潛伏於內心深處，希望結束離散經驗的企求，並且藉由詩歌的撰作傾訴、宣洩、減輕離散之苦。這種特質正是盧思道藉以譜奏亡國之歌，建構離散者身分的要件。王肅投奔北魏之後，除了為拓跋王朝貢獻才學，為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提供助力之外，更戮力於帶兵攻伐南齊而屢建戰功。魏孝文帝因此在重用之餘，對他多了一份親近愛護之情。《魏書·王肅傳》記載了魏孝文帝與王肅之間多次文書往返的情形，其中有兩封詔書很值得注意。其一寫於太和十九年，王肅初次為北魏南伐建功之後。詔文曰：

肅丁荼覬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論再期，疏經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

<sup>98</sup> 此二詩僅見於《梁書》蕭綜本傳，《魏書》不載。詳《梁書》，卷55〈豫章王綜傳〉，頁824。又，《洛陽伽藍記》卷2〈龍華寺〉條下曰：「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有鍾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鍾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為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鍾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鍾歌三首，行傳於世。」可與《梁書》互為補充。詳見〔北齊〕楊銓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2年），頁72。



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論之，為裁練禫之制。<sup>99</sup>

根據此詔書的內容，顯然王肅入北之後，心念所繫都在為親人復仇雪恨，因此詔書中一再以伍子胥的故事類比他的心情與遭遇。為了堅定自己報仇的意志，王肅並未遵從禮制所規範的三年喪期而長期服喪，因此孝文帝下詔，希望他依從「天下之達喪」。另一封詔書寫於太和二十二年，王肅為北魏討平漢陽之後。《魏書》載曰：

（太和）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讖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蹟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sup>100</sup>

這封詔書中再一次的提到王肅「情同伍員」，而「懷酷」、「翦讎」、「讖凶」等詞語，也都指涉復仇的含義。王肅長期服喪，以求為親人報仇之事，在北方顯然廣為人知。北齊楊銜之所撰的《洛陽伽藍記》，也記載了此事，其文曰：

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sup>101</sup>

可見王肅在北魏時，除了世家子弟與朝廷大臣的身分之外，更長期以離散者與復仇者的身分自居，當時社會對他的印象顯然也是如此。蕭綜的情況與王肅略有不同，從他投奔北魏之後的作為與詩歌之中，都看不出有復仇的意涵，但他與王肅一般，都是流亡他鄉，失去家國的天涯淪落人。他在詩歌中所說「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不僅是離散情懷的浮顯，更呈現一種雙重錯置的荒謬與無奈之感。

由於王肅與蕭綜並未留下其他作品，這三首以三言句開頭，繼之以七言句的詩歌，遂幾乎等同於作者身分的文字性表徵。盧思道等人選擇這種詩歌形式，做為集體創作的範式之因已不可考，但這一群北齊遺民選擇了這樣的詩歌範式的同時，其實也等於加入了這種詩歌的作者的行列，讓自己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因為，「如果書寫活動是為了詮釋自己，那麼文體的選擇其實就是選擇表現自己的一個面向。作者不是反映環境的客觀中介，但是也無法全然主觀率意，文體是主客觀聯繫的焦點，作者從文體的程式規範、寓意形式中恍

<sup>99</sup> 《魏書》，卷 63〈王肅傳〉，頁 1408。

<sup>100</sup> 同前註，頁 1409。

<sup>101</sup> 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卷 3〈報德寺〉，頁 136。

然看見被書寫出來的在世界中的自己。個別的生活透過文體的模塑，因此參與了一個累積的公共傳統；這個文體傳統累積了世代的讀／寫經驗，提供作者印證、闡發與擴大個別經驗的機會。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就仿如進入歷史文化的迴廊，在一個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傳統的書寫活動。」<sup>102</sup>因此，可以說盧思道等人以選擇詩歌「形式」為進路，向上繼承了王肅與蕭綜的離散本質，使自己參與離散者的行列，甚至使這首詩成為一個復國隱喻，成為他參與復國行動的先行。

## 五、結語

西元 577 年北齊亡國詩人盧思道被迫遷往北周都城長安，並在進入長安不久，寫下雜言詩〈聽蟬鳴篇〉，此詩深受著名詩人庾信嗟賞。盧思道以詠物開篇，以秋為背景，以悲為基調，以主體錯置、區隔他者與復國隱喻為進程，展開其離散論述。

〈聽蟬鳴篇〉以「秋」為時間軸線與寫作背景，同時喻指詩人當時的人生階段與心境寫照。詩人將自然季節的「秋」結合身體、社會與文化等多重意義，由萬物凋零，涼意日深的自然景象，連接孤寂、殘缺、衰老，乃至感傷流離等情感、心理現象，再循此意義發展，使漂泊無依的他鄉遊子、逐臣棄妻，乃至亡國遺民等離散者，皆成為「秋」的經歷者與「秋」意的領受者。循此，「秋」成為離散者的季節，「悲」成為離散者的基調。秋之「悲」不僅顯現於諸自然景象與心理情境中，更顯現於在時間與空間所形成的雙重阻礙之下，離散者的返鄉無路，想像故鄉遂轉成故鄉想像的悲哀中。故鄉或故國，在深層的意義上，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離散主體及其族群向前繼承，長期建構並依恃的生命意義的源頭，因此，當故鄉只存在於想像中時，生命的意義也同時被解構。「離散」因而不僅是空間的錯置——失根，更是時間的不可追返——失憶，同時也是生命意義的失落——失義；而此失根、失憶與失義，皆因為主體錯置所致。

錯置造成失根、失憶與失義，使離散主體成為一個卑微的受難者，在孤獨之中承受痛苦，猶如失群哀鳴的寒蟬。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蟬的人格化、品德化，乃至政治化，在先秦時期的書寫中即已展開，更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中不時湧現。詩人文士自傷流離，遂逐漸於書寫中強化寒蟬失群哀鳴之特質，使寒蟬成為受難者之象徵。〈聽蟬鳴篇〉以寒蟬開篇，既因寒蟬哀鳴觸發詩人的離散之悲，更因詩人感懷身世而以錯置的寒蟬自喻自託，既強化離散者身分，更於離散者身分之上疊合了受難者形象。

<sup>102</sup> 詳鄭毓瑜：〈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93。

失去家國之後的盧思道，將自己託喻為寒蟬，建構了離散者的身分，孤獨的承受苦難與悲傷。身為進入敵國都城長安的移入者，他則以邊緣人、旁觀者自居，採取了疏離、旁觀與抗拒的態度，透過離散意識將長安再現為一個冷漠的空間，充滿了權利象徵的建築物群，以及穿梭於此建築物之間，追逐名利的輕薄無德之人。追逐名利常須以妥協屈附為交換，對亡國遺民而言，交換方式無非轉為順民，屈附新朝。盧思道更進一步將屈附新朝的順民等同於品德低下的他者而加以區隔在我族之外，使其離散者的身分更為明確，更使離散者、受難者與志節堅定、品德高峻相結合，而高尚的品德與堅定的志節，正是淡泊名利的隱士常見的人格特質。在〈聽蟬鳴篇〉中，都城既然是一個權利追逐的空間，自然不是志節高尚者應處之地；而對於北齊遺民而言，北周政權是造成離散的暴力來源，其帝都長安自難以久處。因此，身處離散之地的盧思道，許下了歸隱之願，企圖擺脫離散。可惜此歸隱之願從未實現，反而成為詩人無形的抗拒，並轉而連接了詩人的復國行動。

雖然盧思道參與復國行動的時間在完成〈聽蟬鳴篇〉之後，但其詩歌早已蘊涵復國隱喻。此復國隱喻隱藏在倒轉、改造典故與詩歌的形式繼承之中。典故的使用，本為了喚起讀者的集體意識，而盧思道在詩歌中將常見的典故，以倒轉、改造的方式呈現，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同時產生熟悉與疏離的雙重效果，以促使讀者重新審視典故，重新尋找新語意，進而形成新的詮釋。因此，當個別常見的典故——保家衛國而投身長期征戰的嫫姚校尉、失去家國而漂泊無依的木梗、作為前鋒奇陣的彩衣土牛，以及存亡續絕、興復家國於旦夕之危的田單——被倒轉、改造後，以新的組合出現時，反而更加引起注意，並且在作者、文本、讀者三者交相作用之下形成一個新的詮釋，而在這個新的詮釋中，浮現了復國隱喻。

盧思道在〈聽蟬鳴篇〉中隱藏的最大的一個復國隱喻在詩歌的形式。此詩的形式是一種以三言句開啟的雜言體詩歌，這種形式顯然與王肅的〈悲平城〉、蕭綽的〈悲落葉〉與〈聽鐘鳴〉形成先後繼承關係。王肅與蕭綽原是南朝世家子弟、帝室後裔，各因不同的國愁家恨而投奔北魏，最後成為客死異鄉的離散者。王肅生前更以長期服喪，矢志報仇，而一再被比擬為伍子胥。王、蕭二人的詩中充滿離散之悲，為典型的離散者之詩。如果考量文體的選擇其實就是選擇表現書寫主體的一個面向，選擇文體形式的同時，也選擇了此一文體形式所形成的書寫傳統，以及向此書寫傳統形成者表示認同。然則，可以說盧思道等人以選擇詩歌「形式」為進路，向上繼承了王肅與蕭綽的離散本質，使自己參與了離散者的行列，甚至使這首詩成為一個復國隱喻，成為他參與復國行動的先行。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 〔戰國〕屈原撰，姜亮夫校註：《屈原賦校註》，臺北：華正書局，1974。
- 〔戰國〕莊周撰，〔清〕郭慶藩編：《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三家注本，臺北：世界書局，1975。
-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重印本。
- 〔西漢〕劉向撰，盧元駿註譯：《說苑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世界書局，1978。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 〔晉〕陶淵明撰，袁行霈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晉〕崔豹：《古今注》，四部叢刊，上海涵芬樓影印宋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66。
-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北齊〕楊銓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2。
-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臺北：明文書局，1999。
-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
-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
- \*〔唐〕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唐〕令狐德棻：《周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4。
-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明〕張溥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辭注》，臺北：世界書局，1979。
- 〔明〕馮惟訥：《古詩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

## （二）近人論著

-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王坤譯：〈布拉格結構主義與劇場符號〉，《符號學與戲劇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8。
- \*王怡辰：〈周隋之際的舊北齊勳貴〉，《通識研究集刊》10，2006：41-54。
- 王美秀：〈高允及其文學初論〉，《中外文學》20.5，123-156。
- 王美秀：〈論洛陽伽藍記中的異史並存與文化原鄉〉，《通識教育年刊》5，19-40。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
- \*牟發松：〈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87-101。
- 杜曉勤：〈北齊文學傳統與初唐詩歌革新之關係〉，《文學評論》5，2008：56-63。
- 李俊：〈北朝後期詩歌創作心理的本土認同〉，《南都學壇》24.2，2004：66-69。
- 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2，2008：131-162。
- 李維譯：《思維與語言》，臺北：昭明出版社，2000。
-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0。
- 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 林玉玲：〈移民與離散〉，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95-128。
-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
- 林淑貞：〈從詩義類比論李賀「馬詩」之自我隱喻與歷史取關〉，《興大中文學報》17，2005：195-229。
- 林淑貞：〈寓意、符號與敘寫技巧--論寓言詩與敘事詩、詠物詩、賦比興之交疊與分歧〉，《興大中文學報》20，2006：27-62。
- 吳功正：〈論隋代的文學審美特徵〉，《東岳論叢》22.3，2001：115-118。
- 邵毅平譯，小尾郊一撰：《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侯立兵：〈漢魏六朝賦中的蟬意象〉，《求索》2007：168-170。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
- 康震：〈歷史的追溯——對隋代詩歌的文化闡釋〉，《唐都學刊》13.2，1997：12-17。
- 康震：〈文化整合視野中的詩史進程——論隋代詩歌的文化史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9，2005：80-84。
- 曹淑娟：〈從廬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收入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
-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 陳小芒、廖文華：〈蟬詩與蟬文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1，2003：189-191。
- 楊玉成：〈士庶、性別、地域——論南北朝的文學閱讀〉，收入李豐楙、劉苑如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 楊金梅、陳海英：〈論盧思道的思想及其詩歌特色〉，《浙江教育學院學報》4，2010：41-45。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詮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67-96。
- 霍然：〈論隋代詩歌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江漢論壇》2，1997：70-73。
- 鄭毓瑜：〈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收錄於《欲蓋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135-168。
- 鄭毓瑜：〈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漢學研究》22.2，2004：1-34。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Washington UP., 1997.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 Bai-yao, *Bei Qishu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aipei: Hongshi Publishers, 1974.
- Li, Yan-shou, *Beishi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Hongshi Publishers, 1975.
- Ling-hu, De-fen, *Zhoushu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Zhou)*, Taipei: Hongshi Publishers, 1974.
- Lu, Qin-li, *Xian-Qin Han Wei Jin Nan-Bei Chao shi (Collection of Poetry from pre-Qin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aipei: Muduo Publishers, 1983.
- Mou, Fa-song, “Jiu-Qi shiren yu Zhou Sui Zhengquan (the literati of Northern Qi and the regime of Northern Zhou and Sui)”, *Wen Shi (Studia sinica)*, 2003 vol. 1, pp.87-101.
- Wang, Yi-chen, “Zhou Sui zhiji de jiu Bei-Qi xungui (Northern Qi nobles in the time between Northern Zhou and Sui)” *Tongshi yanjiu jik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for General Education)*, vol.10, 2006, pp.41-54.
- Wei, Shou, *Weishu (History of the Wei)*, Taipei: Hongshi Publishers, 1977.
- Wei, Zheng, *Suishu (History of the Sui)*,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87.
- Yang, Yong, *Luoyang Qielan ji jiaojian (Luoyang Qielan ji with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Taipei: Zhengwen Book Company, 1982.
- Zhang, Pu, *Han Wei Liuchao baisan mingjia ji (Literary Collections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famous writers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Shanghai: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2.

## Displacement, Distinction and Metaphor: On the Diaspora Discourse of Lu Sidao's "Ting chan ming pian"

Wang, Mei-hsiu

(Received June 23, 2011; Accepted October 12, 2011)

### Abstract

Lu Sidao, the famous poet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wrote a poem "Ting chan ming pian" ("Listening to the autumn cicada") after the fall of his country Northern Qi. A profound discourse of Diaspora was consisted in the intermixed-sentences style poem. He wrote with autumn as a centerline of the poem structurally and employed the image of the autumn cicada as a symbol to construct his own identity of Diaspora.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displacement of subject is the main causes of diasporas, spatial misplacement, the past that never return and losing life value make diasporas find themselves no place to belong to and make them become isolated and humble victims in the society where they stay. He further on used the ideology of Diaspora to represent Chang'an, the capital of hostile country, as a city of coldness and emptiness. He categorizes the officials, who used to serve Northern Qi and now turned their loyalty to serve new ruler, as immoral people and distinguished them into 'others'. His wish of being a hermit was never come true but turn into an invisible signal of resistance which connected to his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of a rebellion and tried to restore his country. In the poem, some common allusions were also reversed and original meanings were turned clearly into the notion of nation restoring. In addition, he emphasized the identity of Diaspora through inheriting an old poetry form as a metaphor of nation restoration.

Keywords: Lu Sidao, "Ting chan ming pia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Dynasties,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Diasporan literature